

## 雙面蕭紅—論《呼蘭河傳》與《馬伯樂》 的國民性意識與風格差異

黃文倩<sup>\*</sup>

### 摘要

《呼蘭河傳》與《馬伯樂》是五四時期中國女作家蕭紅（1911-1942）的晚期長篇小說，均完成於 1940、1941 年左右。我從兩部小說交集的「國民性」主題，進行「一種」歷史意義與風格對應的解讀與釋疑。本文認為，由於對鄉土的情感認同，在《呼蘭河傳》中，蕭紅是用童心、美學性的眼光，以「消解」的態度，來理解基層人民的國民性，因此雖有批評性質的國民性意識，但整體風格傾向抒情；而在《馬伯樂》裡，則是「繼承」與「轉化」魯迅對中國人民的國民性批判，意識重點在突顯並諷刺小知識分子精神勝利的劣根性。兩部作品在同個階段完成，不但能看出，蕭紅有冷靜與分裂的理解兩種不同對象的能力，也說明，她對自己的創作意識與風格筆法的對應選擇、整合有足夠的自覺。因此，放在一般五四時期的女作家，或長於閨秀、或重於戰鬥的二元傾向座標下，蕭紅個人，及這兩部同期、但表現雙重特質作品的現象，可以視作，在對日抗戰開始，及在文化圈更為實用功利的歷史條件下，一種個人特殊性與社會性格辯證並存的選擇。也是抗戰開始後，作家掙扎與轉折模式的一個重要參照座標。

**關鍵字：**蕭紅、國民性、個人性、社會性、抒情與批判風格

---

<sup>\*</sup> 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 A Study on the Conscious of Nation and Writing Styles of Xiao Hong in Her Fictions *The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and *MaPoLe*

Wen-Chi en Hu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nation conscious and writing styles in Xiao Hong's fictions: *The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and *MaPoLe*. The above fictions show a strong conscious of nation in different way. *The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appears highly lyrical, while *MaPoLe* presents an irony style and makes criticize to young intellectuals. Considering the both fictions were written in 1940s, the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could imply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and social-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hich refers to a mixture or adjustment of inner and external conflictions.

**Key words:** Xiao Hong, Nation Consciousness, individual, social, lyrical, irony style

---

<sup>\*</sup>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蕭紅(1911-1942)是中國大陸三〇年代的代表作家。長期以來，她的作品的寫實抒情風格，幾乎已經是被學術界定調的常識<sup>1</sup>。但是，隨著中國大陸新時期開放以來，哈爾濱出版社於1998年，重新出版完整的《蕭紅全集》，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掌握蕭紅的整個創作歷程，也對於一生流離失所的蕭紅的其它多面性產生了好奇。

儘管蕭紅的研究已經繼張愛玲之後，成為研究大陸現代文學的顯學之一，但我仍在蕭紅短暫的創作年限中，注意到一個奇特而少人關注而頗有意義的問題：她晚期的兩部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及《馬伯樂》其實均完成於1940、41年<sup>2</sup>，相隔不過一年，但整體的意識及風格差異極大。跟一般作家同一時期、同一種文體(小說)的創作，意識與風格往往相去不遠比較起來，顯然是一個值得探討與理解蕭紅的進路。

本文以《呼蘭河傳》及《馬伯樂》交集的「國民性」主題為進路，佐以蕭紅的生平及創作歷程，對這兩部作品，同時具備的國民性意識的主題，進行解讀，進而釋疑當中並存兩種不同風格的歷史意義。具體的方法之一是，將先分析蕭紅的國民性意識的生成與發展，進而在《呼蘭河傳》及《馬伯樂》中，討論兩種不同的國民性主題的意識傾向。其次，分析《馬伯樂》的國民性意識，在魯迅〈阿Q正傳〉後，所繼承的影響及其轉化。最後再回應前兩節的分析，對這種「主題相同、內在意識卻不同」所造成的兩種風格，並存於同一時期的現象，所代表的歷史意義，提出一種詮釋。

<sup>1</sup> 例如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即抱持此項觀點。見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532。

<sup>2</sup> 蕭紅的《馬伯樂》第一部，完稿於1940年，並於同年出版；第二部則是在1941年完稿。而《呼蘭河傳》完稿於1940年12月20日，應該晚於第一部的《馬伯樂》。但無論如何，蕭紅竟然可以在相近的期間內，同時完成兩種風格迥異的作品，這種狀態實在是非常特別，目前也未有研究者以此兩部作品共同交集的「國民性」的角度進行「比較」分析，故本文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 二、從《呼蘭河傳》到《馬伯樂》：蕭紅的國民性意識的生成與發展

「國民性」，廣義的來說，是晚清一直延續到現當代的一種有自覺反省中國人民的素質的一種指涉<sup>3</sup>。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國民性」的重要，國民性表現在人民的內在心理及外在行為，只有對人的生命抱持著應該有更美好、更理想的期盼時，才會成為作家與人們自覺的實踐。對於一般人、或生活在社會底層導致於無能力改善、或麻木的人來說，有沒有更好的國民性其實很難成追求的目標。

蕭紅的故鄉在東北，是日本最早開始侵略中國的地方，根據蕭紅年表<sup>4</sup>，1928年，蕭紅念中學時，曾參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修建吉敦鐵路的示威，而後被父親、繼母強制返鄉。1930年她的祖父去世後，她就正式離家出走，離家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除了不滿封建家庭這種五四時期很普遍的原因外，我認為蕭紅自己的獨特性格才是最大的主因。她出走後，曾寫過不少自傳性的散文，很能佐證她內在的那種高度的敏感、痛感、關懷傾向與自省的個性，也能幽微的看出她日後的發展路線。例如在1933年的散文〈破落之街〉中，蕭紅寫到自己流落街頭的慘況，但儘管時常處在飢餓的困窘、儘管自己的情況也非常不堪，但她還是能意識到她周遭世界的悲慘，很少太過度的自我中心與自憐，甚至還能難得地同情的意識

<sup>3</sup> 國民性建構，是晚清到五四時期非常重要的論題，不同的作家，對國民性的理解與期待，也可能不同，內涵非常複雜，研究的學者也極多。而在對魯迅的國民性論述，較具代表性的，如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由於本文旨在透過《呼蘭河傳》及《馬伯樂》中的國民性主題的解讀，進而論述導致蕭紅「風格差異的原因」。因此並完全非是專門針對「國民性」的主題學式的詮釋，故為求聚焦與符合本論題的宗旨，不進行平行式的五四時期的國民性主題的交叉比較，僅從魯迅可能影響蕭紅的國民性意識，作為論述的出發點。

<sup>4</sup> 本文所引用的蕭紅年表，參考蕭紅：《蕭紅全集下·蕭紅生平事跡考》，（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頁1390-1531。

到，大部分的基層人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脫離他們的困苦生活的現實，她對於自己的無能為力，發出過超齡的自省與譴責。寫出這種話時她也只有 22 歲：

我們也是一條狗，和別的狗一樣沒有心肝。我們從水泥中自己向外爬，忘記別人，忘記別人。<sup>5</sup>

另一個可以看出蕭紅內在個性的代表例子，是 1936 年的一篇自傳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這篇文章中，蕭紅揭露，小時候自己的父親，曾經爲了房屋租金，完全不考慮房客的生存，硬要收到自己應有的「權益」。她使用「貪婪」來形容自己的父親。成年後的蕭紅對於這種行爲仍然不能諒解。

敏感的個性、深刻的自省傾向加上對於家庭、對於過去傷害的耿耿於懷，再在五四反封建、性格解放，與北伐後左翼文學思潮日流成爲主流的綜合背景，會導致蕭紅把關懷的重心從家庭位移至人民、從小我轉向大我的發展，就一點也不意外。這些經驗也都造成她日後，沒有完全成爲一個純粹，用今天的語言來說--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家，而多少會以社會批判來平衡內心的憤怒，在蕭紅最早的代表中篇小說《生死場》(1935)中，已經開始以揭露一個麻木的農村社會，來表現小知識分子，企圖介入社會關懷、社會實踐的立場--《生死場》中，王婆可以摔死小孩然後繼續幹活、金枝的男人可以在金枝懷孕後，仍然不停的要求與她媾合，月英的下半身癱瘓、甚至長出蛆蟲，丈夫也棄之不理，每個人物都糊里糊塗生、不知不覺死，短暫的溫暖只是一種偶然的相濡以沫，甚至還帶著那麼一點「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宿命味道。但儘管蕭紅再怎麼將重心放在寫景敘物，再怎麼樣讓她筆下的人物看似糊塗有糊塗的道理，她最後還是安排二里半和老趙三也都加入抗日、革命，這也就能夠看成，蕭紅在早期，既使還在不太自覺的創作摸索中，也已經

---

<sup>5</sup> 原表於日爲 1933 年 12 月 17 日，後曾收至蕭紅散文、短篇小說集《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 11 月。本文引用的版本乃出自：蕭紅：《蕭紅全集中·破落之街》，（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年），頁 699。

能夠直覺意識到社會與歷史發展的辯證性，就跟她在 1933 年的散文中，已經早熟的意識到基層大眾的困境一樣--在那樣環境下，人民的出路，很難不以社會運動的抗爭來實現。

然而，真正讓蕭紅的社會意識，從直覺轉變成自覺的狀態，還是要以她後期的兩部重要的長篇《呼蘭河傳》及《馬伯樂》為代表。如果對照她寫出《生死場》到後期的生活狀況，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數年間，蕭紅的生命發生過許多重要的變化與轉折。在學習及人生啓蒙上，1934 年 11 月起跟魯迅的結識及互動，是關鍵的經驗<sup>6</sup>。在她的著名散文〈回憶魯迅先生〉(1939)中，蕭紅就曾寫到：「魯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時間沒有幾年了，死了是不要緊的，只要留給人類更多，魯迅先生就是這樣。」<sup>7</sup>這種狀態似乎可以從蕭紅晚期臥病在床，明明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但仍發憤的創作實踐中，看到她對魯迅精神的深刻理解與繼承；在愛情生活上，蕭紅自 1932 年與蕭軍結婚，6 年後離婚，馬上又在 1938 年與端木蕻良再婚，而後又還有一個駱賓基，以「知音」的身份，一路在端木不在她身邊時守候著她，幾年間密度相當高的感情經驗，也讓蕭紅一直處在不安定的心情中；再加上，受到 1938 年對日抗戰開打的波及，蕭紅更是輾轉流離於武漢、山西、西安、重慶、香港等地，如果再加上之前遠赴的日本的經歷，蕭紅的生活狀態可說幾乎一直都處在流離波動中。這樣的狀態從個人的生命來說，有其殘酷的一面，但從藝術創作來看，卻也是難得的養份。因此，當蕭紅於 1940-1941 年間以自傳性筆法，分別寫出《呼蘭河傳》、《馬伯樂》第一部及第二部，就可以看出蕭紅的作品已經跨過早期的青澀，並且開展出成熟的傾向。

<sup>6</sup> 有關於蕭紅、蕭軍跟魯迅結識與交往的過程，可參見林敏潔〈魯迅與蕭紅交往考索—兼論《回憶魯迅先生》《民族魂魯迅》〉，《新文學史料》，2001 年 03 期，頁 126-136，有相當完整的整理。

<sup>7</sup> 原表於日為 1939 年 10 月，後收至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生活書店一九四〇年七月出版。本處所引用的版本乃出自：蕭紅：《蕭紅全集中·回憶魯迅先生》，（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年），頁 945。

於是，就在這裡，我們看見蕭紅最奇特的發展--同一個作者，在同一個期間(1940-1941)，所書寫的兩部長篇小說，它們雖然分別取材於她的童年及成年後的經歷，但整體的風格及藝術表現的卻有著極大的差異。《呼蘭河傳》基本上就如目前學術界所定評的，是一部童年自傳抒情小說，但《馬伯樂》卻非常明顯的，是採用冷靜的諷刺筆法，針對知識分子所寫的諷刺寓言。兩者有交集之處，反而是對「國民性」的思考，這是極為有趣的現象，可以被視為，晚期的蕭紅對於中國人民的想法已經沉澱，但是在她內心中，仍有「兩套」不同的國民性意識。

### 三、《呼蘭河傳》與《馬伯樂》的國民性意識比較

在《呼蘭河傳》中，蕭紅往往會以作者身份、童年視角，勾勒那些帶有國民性的細節—例如那些永遠不修補、永遠都有動物或搞不清楚狀況的行人掉下去的泥坑；十二歲的小團圓媳婦從一個活潑潑的小女孩，被迷信和眾人的道聽塗說整死，而人們還很遺憾，沒能觀賞到大規模的小團圓媳婦的洗澡(活活被燙昏)的過程；對於瘋子、傻子這一類的人物，這些人民很容易就以人世間這樣的人多著的想法，自動節省同情心；而在七月十五鬼月生的女孩雖然很難出嫁，但是若家裡有錢，大概也就自動變得不那麼惡；那些把女子塑象弄的溫順的企圖，只是要讓人家覺得女人家是好欺侮的，畢竟：「人若老實了，不但異類要來欺侮，就是同類也不同情」<sup>8</sup>；甚至末章的馮歪嘴子的太太死了，大家都等著看馮歪嘴子上吊、跳河，等著看人家一生趕快終結，把別人的苦難當笑話來看與流傳。

看客、麻木、無知、迷信的國民性，在魯迅《吶喊》、《彷徨》中曾存在的，到了1940年的蕭紅所回憶起來的童年世界，也仍然鮮明的存在。而蕭紅跟魯迅一樣，對於那些舊式的腐朽裡卻偶爾也

---

<sup>8</sup> 蕭紅：《蕭紅全集上·呼蘭河傳》，（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頁155。

留有餘溫、儘管已經全無營養的血液，似乎總有一種難以完全割斷的情節。我想，就是基於這種微妙的感情，在《呼蘭河傳》中，作者其實有意識到，她所批判的國民們，就像她早期在寫《生死場》中的人民是一樣的——他們都是農村社會、封建社會最底層的人物，迷信、習俗長期因襲，合理來的說，他們之所以如此沒有所謂「公德心」與「同情心」，完全不是因為他們是壞人，而只是「生活本來就是如此」、「大家都這樣」，也就是說，它們是社會歷史所造成的，而不能僅視作是個人的問題。而蕭紅也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長大」的、也曾經在這些「封建」生活中也得到過「樂趣」與「啓蒙」的——《呼蘭河傳》的「我」，不也是吃過祖父從那個泥坑撈起來的死豬及小鴨；小團圓媳婦大規模洗澡，「我」也是「看客」之一的，還是熱熱鬧鬧湊上去看的那一種；祖母死了，「我」還因此得以「見識」到各式各樣的人，被帶離家到大路上去，知道這個世界上原來還有別的地方、人生可能還有別的路可走。總之，就是這些腐朽的國民與國民性「滋養」了「我」的。蕭紅一方面批判他們，一方面又刻意使用「童年」的、接近純美學的眼光來理解他們，這時候，一切的是非、善惡竟然就全部撫平了，作為作者的蕭紅，因此也能在當中得到最大的慰藉或拯救，這種抒情性中和批判性，使得《呼蘭河傳》的國民性的批判效果，多少被其純情的本質嚮往給相互抵消。

也因此，在《呼蘭河傳》這樣的書寫下，我們幾乎要以為，蕭紅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學界定評與強調的「抒情」風格，追求的是美學式的、奇妙的自我解消的「無目的」的「目的」。但是本文在上面已經言及，她幾乎在同個階段，也可以同時控制她習慣性的「解消」傾向，寫出社會批判意識非常明顯而強烈的《馬伯樂》，節制可以帶給她高度心智愉悅，甚至其實暗藏自虐與安慰的書寫方式，就不能不說有相當的「現實」認識。一般來說，作家的作品轉折及風格變化，如果不是因為選用的文體不同，而導致一定程度上的風格差異，在同一種文體的風格變化或再生產，仍往往需要一段時間的學習，或再經歷一些社會變遷或個人意志的歷練，無論是寫實、



現代或後現代作品都多少需要這種歷史進程。但是蕭紅以其極高的寫作才情，顯然已經能充份自我控制，將她在過去數年的生命歷程，冷靜的分成兩個部分來對待。她把自己的童年留給《呼蘭河傳》，成年以後的世界則在《馬伯樂》彰顯，而在後者，我們更可以看到蕭紅集中的，深化她自己早期的自省性格，對於自己、及像自己這一類的「小知識分子」的國民性，進行全面檢討與自我批判。而在這一點上，蕭紅對自己簡直是一點都不客氣，完全有別於她在《呼蘭河傳》中對身邊的底層群眾的溫情。

《呼蘭河傳》跟《馬伯樂》的國民性書寫最大的技術差異，從結構上來說，《呼蘭河傳》的國民性意識的是分散的、附帶的書寫，並不是全文的重心，而在《馬伯樂》，卻變成集中的、專門的主題。在意識上，《馬伯樂》的核心就是要表現當時的知識青年的崇洋媚外、思想與行動的巨大落差。馬伯樂這個角色的出生跟蕭紅的背景很類似，他來自一個還算有錢的家庭，雖然不太給他錢。家裡信仰的是基督教，給他取名馬「保羅」，但他覺得沒有民族自尊，才自己改成有中國暗示「伯樂」。但矛盾的是，馬伯樂進中國商店買東西就插隊，進外國商店就乖乖排隊，一下子瞧不起外國人，一下又動不動就冒出「真他媽的中國人」，十足嫌惡自己的同胞，連讀小說都讀外國小說，覺得讀中國小說不夠勁等等，崇洋媚外，又不肯承認；除此之外，馬伯樂還曾參加學運、對國家事物很有個人見解，但實際書卻讀的不紮實，只會說而不事實踐；平常很重結交文人朋友、請客清談，但一旦家庭的金錢供應斷絕，便完全沒有工作能力以獨立生活；甚至在逃難間，儘管社會和自己狀況已經極為狼狽，還繼續精神勝利的安慰自己，覺得至少自己在「判斷」逃難(小說的背景是在對日抗戰期間)的「速度」上，非常準確，自以為跟平常百姓的後知後覺要來得高明。馬伯樂對真實社會的困境，根本上沒興趣也不關心，能逃避就逃避，但是對自己「個人」的事，馬伯樂也無能力走出一片天--開書店因經營不善而不了了之，想寫作開了頭就無法力求維持，談個婚外情因沒有勇氣所以一點也不見精

采。馬伯樂活著，就是得過且過，一天過一天，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沒有特別愛與特別恨的人，妻子、子女、家庭、外面曾經偷偷愛戀過的女人，都沒辦法真正打動他的心。不關心社會，也不愛惜別人與自己，自己的想法又因為常常動搖而導致簡直毫無信念可言，走向徹底的虛無。

五四期間的小說，有過許多鮮明的精采人物，我們看到過，魯迅〈孤獨者〉的魏連殳與〈在酒樓上〉呂緯甫等孤獨與妥協的知識分子、茅盾〈動搖〉中的胡國光式的權術小人，與孫舞陽式的現代女性、郁達夫〈沉淪〉及丁玲〈沙菲女士的日子〉裡，流露與追求情感與慾望的個人主義者。總之，不管他們是關心、涉入社會的現實派、還是較強調個人情感的浪漫者，他們至少都對人生有所追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存在的力量與個人的意志。在這種同時期的人物的印象排比下，我們幾乎可以說，馬伯樂的特色就是既不能現實，也不能浪漫，完全是有氣無力的「中間派」，我們很難以實證法來統計，這種「中間派」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當時到底有多少，但筆者認為，絕對比前兩種要多很多。在這層意義下，我們不得不佩服蕭紅有她的先見之明，能夠以選擇「馬伯樂」這種人物，來集中的彰顯「新」知識分子的「國民性」。

#### 四、《馬伯樂》的國民性意識繼魯迅〈阿Q正傳〉的影響與轉化

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與其國民性，也很容易跟魯迅〈孤獨者〉中魏連殳的那些「不幸的青年」、整天唉聲嘆氣的年輕朋友聯想在一起。當然魯迅是不願意正面批判年輕人的，閩土小孩的明天，或許就是中國的希望，總比已經完全定型、而一絲一毫都無法改變的阿Q來得有空間。但我們當然也可以假設，阿Q的後代，就算有了錢、讀了書，他是否就能夠一定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是否就能不再精神勝利？如果以魯迅逝世後的中國近代史來看，顯然距離這樣的理

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1934年11月，蕭紅跟魯迅先生正式結識，一直到1936年10月先生過逝為止，蕭紅跟魯迅的互動關係可說相當密切，在她日後寫過的〈魯迅先生記(一)〉(1938)、〈魯迅先生記(二)〉(1938)及前面已提過的〈回憶魯迅先生〉(1939)的文章中，蕭紅顯然能敏銳的知覺到，魯迅精神中的進步性。在〈回憶魯迅先生〉中，她曾經捕捉到兩個非常象徵性的魯迅印象，一個是魯迅先生走路方式的輕捷，是「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的走去」<sup>9</sup>；另一個更直探本心的例子是，魯迅先生講鬼故事給大家聽，說到他路過墳地踢了人家一下的故事，蕭紅寫到：「魯迅先生是不相信鬼的．．．不但不怕鬼，對死人也不怕，所以對於墳地也就根本不怕。仍舊是向前走的」<sup>10</sup>，後面加寫：「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腳立刻變成人了」<sup>11</sup>。

基於對魯迅進步性的體認，再加上蕭紅個人的經驗及才情，魯迅所關心的阿Q式的、一般中國人民的國民性，到了蕭紅這裡，才比較具體地轉化為對小知識分子國民性的反省。這種題材其實跟蕭紅在《呼蘭河傳》中的本質有其類似處，因為都跟蕭紅生命經驗密切相關。她在逃家十年的過程中，都一直跟一些所謂的年輕的革命份子在一起、參加各式的抗日與革命活動，但是以蕭紅對自己生命的忠誠，她必然多少有知覺到，包括像她自己及小知識分子們在參與革命活動中的膚淺、荒謬性與機會主義的立場，因此她才能採用各種細碎的細節來反映、想像、甚至是重構馬伯樂，這個角色的存在，就是蕭紅看清他們，並且檢討自己的證明。

《馬伯樂》式的小知識分子們，因為比較「聰明」，可以「精神勝利」的「方法」跟阿Q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阿Q的行為至少都是外顯的，他會亂說話/說錯話以致於招打、直覺起了

<sup>9</sup> 蕭紅：《蕭紅全集中·回憶魯迅先生》，（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頁944。

<sup>10</sup> 同上註，頁956。

<sup>11</sup> 同上註，頁957。

性慾以至於向吳媽下跪，我們在他上了城以後對事物的不滿，諸如認為人家將長凳稱為條凳、煎魚用蔥絲及嫌女人的走也扭得不好的判斷中，就可以看清阿 Q 欺善怕惡、見識淺薄及夜郎自大的本質，由於阿 Q 的言語及行為，往往都是藉由與他人互動而外顯，問題非常「明顯」，因此要改造起來也就比較單純。

小知識分子的國民性就非常「內斂」，他們活在內心世界的時間，比跟外在社會、客觀世界互動的機會要來的多。再加上一般在中國傳統中，讀過書的人比較受到社會的尊重，即使進入五四時期的所謂新社會亦然，仗著更寬廣的精神空間與時間，很少作家會留意到，小知識分子們的自私、精神勝利和輕鬆的行走在「中間」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蕭紅以女性的細緻，將《馬伯樂》寫的極為瑣碎，也不是完全沒有優點的，她讓我們詳細的看到，一個小知識分子在社會、戰爭的巨變中，可以如何「自圓其說」的繼續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且，還可以將外在的困苦，轉化為荒謬的趣味，而使自己逃避到「自在自得」的境界。

馬伯樂跟阿 Q 的精神勝利的差異在，他們能「創造」更漂亮及聰明的道理，來確保他們的狀態。例如，馬伯樂受不了家庭的束縛（其實小說也看不出來他束縛何在，因為他家裡有錢、有房子住、同時也不用工作），但是他的「精神」，就是會莫名奇妙的感到痛苦，「封建」嚴格來說根本沒有「壓迫」過他，但馬伯樂就是自己覺得被「封建」家庭束縛，只因為家裡該給他的錢都沒有給、太太對他又不夠好、看不慣家裡崇洋媚外，但自己崇洋媚外就沒關係，總之，沒有一件事看的順眼，他是一定要叛逆，一定要逃家、一定要自由的，他的自圓其說的離家論非常的有「道理」：

青年人久住在這樣的家裡是要弄壞了的，是要腐爛了的，會要滿身生起青苔來的，會和梅雨天似的使一個活潑的現代青年滿身生起絨毛來，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時候，腳踏在那些海草上邊，那種滑滑的粘膩感覺，是多麼使人不舒服！慢慢青年在這個家庭里，會變成那個樣子，會

和海底的植物一樣。<sup>12</sup>

爲了要追求讓自己「舒服」的「感覺」，馬伯樂就離家出走了，他想了一個好辦法，說要到上海開書店，家人以爲他終於要長進了，索性就支持給了他錢。讓馬伯樂開書店、搞文學、跟文人們交際，但馬伯樂只懂「精神」和「道理」的，完全不識實務與營生的，所以書店又很快就關門了。回了家後，家人當然更瞧他不起。馬伯樂的「精神」又受不了了，「幸好」蘆溝橋事變爆發，他就又得以用「逃難」的藉口逃到上海去了，他覺得自己非常先知先覺，戰爭是遲早要漫延的、留在東北一定是要等死的，儘管當時日本還並未攻打到他青島的家。而到了上海的馬伯樂，儘管很快就沒錢了，生活慘淡，可是當他走在上海的街上，發現人們都並不知道東北戰爭已經開打，可能很快就會漫延到上海，馬伯樂對於自己仿佛掌握著比別人更多的消息而感到驕傲，於是生活的慘淡竟然就因此被合理化了，自己也完全不用負責，因爲馬氏的邏輯是：「這是逃難呀，這不是過日子，也不是做生意。」<sup>13</sup>事實上他從來沒腳踏實地的過過日子，生意也是放著自生自滅，戰爭與逃難，只是他繼續無所事事、虛無渡日、甚至從這個過程中獲得緊張與寄託的一種方法。馬伯樂一輩子都沒主動關心過什麼事、也沒主動實踐過任何信念，但是他跟阿Q一樣，只要自己願意，馬上就可以「建構」出各種「道理」來讓自己好過。這一場戰爭，讓他精神上覺得，自己與中國民族的依存是有密切關係的，讓他忽然覺得自己變的「更有用」，可以「思考」的事情愈變愈多。但是沒有錢又是不行的。小說就在這種馬伯樂一邊想著各種道理，一邊荒謬的揣想東北戰爭開打後，他的太太就會也逃到上海來，給他帶來家裡的錢，讓他可以既享受外在世界嚴肅緊張的生命感，又完全不用負擔任何實際的責任下繼續過活。

到了第二部，馬伯樂的精神勝利發展的更「深入」，他帶著太太和小孩真的在逃難了，可是他的逃難一點都沒有莊嚴與緊張感，

<sup>12</sup> 蕭紅：《蕭紅全集上·馬伯樂》，（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頁280。

<sup>13</sup> 同上註，頁324。

在整個逃難的過程中，他仍然慶幸自己沒有變成「傷兵」、也無視於混亂人們的痛苦狀況，仿佛是帶著重來沒有過過這種日子的新鮮眼光在「品嘗」這種混亂的世局，狀況是這樣的：「每一次列車的開到，必然有傷亡的。年老的人一跌就跌斷了氣。小孩被人擠死了，被人踏死了。婦女們還有在枕木上生產。」<sup>14</sup>反正那裡都是會死人的，我馬伯樂也是逃難的一員，也是自身難保，也是很辛苦的。後來，他們要搭乘一艘非常破的船去漢口，有些群眾就質疑這樣的船會要人命，還敢收錢，但是船東非常能訴諸理想的發國難財，兩面平衡的運用辭令，明明就是客觀很差的事物，硬是可以轉化成為民族精神的載具，他發表出這樣的演說：

諸位不要憑感情用事，要拍一拍良心，人總是有良心的。吹毛求疵，那是奸徒之輩。在我全國上下一心抗敵的時候，不怕任何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才是我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才配做黃帝的子孫。<sup>15</sup>

馬伯樂原本也覺得這船太破，也有意見，但船老板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馬上又覺得這個老闆真是坦白，似乎看得起自己，也覺得人家說的話，才是真正「非常正大光明的敢做敢為的有什麼就說什麼的一個天真的人」<sup>16</sup>，馬上心態立刻調整，以獲得他想要的精神勝利與尊嚴。

逃難安定後，馬伯樂開始想要做些什麼事，一下想當裁縫、一下想學開汽車、一下又想加入戲劇團體表演，但仍沒有一件事情付諸實踐。他虛無悲觀，做不了任何實事，但「善用」他身邊各種可以「成全」他繼續悲觀的「條件」，以「確保」他可以繼續「維持」他的狀態。最奇特又精采的隱喻是，馬伯樂想著：「下雨大地就是濕的」、「陰天就沒有月亮」<sup>17</sup>，如果單獨來看這兩句話，會覺得實在很有智慧，人生一切似乎都不能勉強，只能順其自然。然一旦放

<sup>14</sup> 同上註，頁 442。

<sup>15</sup> 同上註，頁 462。

<sup>16</sup> 同上註，頁 462。

<sup>17</sup> 同上註，頁 512。

回小說的歷史社會的語境，就能看出馬伯樂意識上的自我逃避與合理化傾向。因此他始終覺得虛空、虛無，直到戰爭又漫延到他的身上，又要再逃到下一個地方為止，他終於能再次聚精會神起來。最後他和他的太太的對話，和這篇小說的結語是這樣的：

太太說：「買船票到哪裡？」

馬伯樂說：「人家到哪裡咱們到哪裡」

於是全漢口的人都在幻想著重慶。<sup>18</sup>

蕭紅顯然很諷刺的暗示，這種人物其實是很多的。像馬伯樂這樣書念的不上不下，家裡有一點錢，從來不願意主動去開創任何事，僅僅隨著世事浮沉的人是很多的。他們並不真的不關心五四思潮、不關心戰爭和其它人民的苦痛，無意讓人生更好或更壞，既不能左，也不能右，是不願意拿出擔當或存在選擇的「中立」派。馬伯樂式的人物，之所以還可以繼續精神勝利，就像魯迅〈端午節〉中的方玄綽，都是只要狀況還沒有壞到完全活不下去，經濟還能持續（僅管是最低度的持續），就繼續得過且過的走下去。

## 五、結論

綜上所論，蕭紅在《馬伯樂》中，反映的是五四以來，其實就一直存在、但總在其他小說鮮明人物的排比下，被忽略的小知識分子的國民性。她繼承並轉化魯迅對基層百姓的國民性改革，將重心集中在諷刺中西融合的新式小知識分子，有一點經濟條件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勝利、逃避現實及虛無飄渺的國民性格。

跟《呼蘭河傳》最大的不同是，在《呼蘭河傳》中，蕭紅是以美學性的態度，來表現她對一般基層人民國民性缺點的「理解」。而《馬伯樂》中，則是建構與突顯知識分子一樣有精神勝利的劣根性。兩部作品還在同個階段完成，就可以看出：蕭紅同時存在兩種

---

<sup>18</sup> 同上註，頁 513。

不同的國民性意識。她的價值傾向與風格展現的歷史意義，便可以試著這樣理解：對於曾經承載過自己成長的鄉土人民，蕭紅選擇在理解了他們的國民性後，以美學的眼光消解批判意識，因此充滿抒情。而在面對以自己為核心的小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時，蕭紅採用毫不留情的揭露與諷刺，包含自己在內的這一類的人物的虛無的國民性。因此，雖然她的《馬伯樂》第三部續篇還來不及寫<sup>19</sup>、雖然她在最後短篇小說〈小城三月〉仍給予自己過於溫情的救贖，雖然她已經來不及解決像她自己一樣的小知識分子侷限，但是以她晚期的精神及身體的惡劣狀況，她還能既能「消解」又同時「建構」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小說，彰顯自我完全不同的兩種側面，對於兩種不同的對象提出她的國民性回應，她的才華、創作實踐的毅力及能力，已經能相當地證明，蕭紅除了「抒情」之外，亦有諷刺與批判的風格。所以，放在當時五四時期的女作家，或長於閨秀、或重於戰鬥的二元傾向的座標來看，蕭紅個人，及這兩部同期、但表現雙重特質作品的現象，可以視作，在對日抗戰開始，及在文化圈更為實用功利的歷史條件下，一種個人特殊性與社會性格辯證並存的選擇。也是抗戰開始後，作家掙扎與轉折模式的一個重要參照座標。

---

<sup>19</sup> 蕭紅在《馬伯樂》第二部末註明「第九章完，全文未完」，可見原本是計畫再繼續寫下去的，但不幸，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 參考文獻舉要

### 一、文本

1. 蕭紅《蕭紅全集》(上中下全三卷)，(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
2. 肖風編《蕭紅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
3. 葛浩文編《蕭紅的商市街》，(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年。
4. 丁玲《丁玲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 二、其它專書

1. 葛浩文著《漫談中國新文學》，(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80年。
2. 葛浩文著，鄭繼宗譯《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3. 蕭紅《蕭紅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北方論叢編輯部)，1983年。
4.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
5. 費正清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1912-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6. 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7.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
8.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全三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4月。

### 三、期刊論文

1. 何寄澎<鄉土與女性—蕭紅筆下永遠的關懷>，《中外文學》第21卷第3期。
2. 艾曉明<女性的洞察——論蕭紅的《馬伯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4期，頁55-77。
3. 陳悅<生存就是逃避——《馬伯樂》人物形象剖析>，《貴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43-46。
4. 焦玉蓮<批判無價值無意義的生存——蕭紅《馬伯樂》與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人物形象比較>，《呼蘭師專學報》，1998年02期，頁25-28。
5. 陳潔儀<論蕭紅《馬伯樂》對“抗戰文藝”的消解方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2期，頁80-90。
6. 秦林芳<魯迅小說傳統與蕭紅的小說創作>，《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頁47-55。
7. 林敏潔<魯迅與蕭紅交往考察—兼論《回憶魯迅先生》《民族魂魯迅》>，《新文學史料》，2001年03期，頁126-136。
8. 楊曉木<論“蕭紅體”小說的“另類”《馬伯樂》>，《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4期，頁8-11。
9. 冉小平<對國民性的思考和生命意義的探索——重讀蕭紅的《馬伯樂》>，《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第4期，頁47-49。